

第三章 後冷戰時期中共戰略思維的轉變

以往中共對戰爭的假設在於應付擁有優勢武器大國（美蘇）的入侵，因此採取誘敵深入伺機反攻之守勢作為，在擁有廣大縱深的有利條件配合下，人民戰爭一直都是中共主要的軍事戰略。這種情況在國內外環境改變後起了變化；中共空軍，也就是所謂的「人民解放軍空軍」（PLAAF），正處於關鍵性的轉變時期，因為它正從一個陳舊的龐然大物，要改造為現代化的部隊，準備進行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國空軍絕大部分的戰機，都是由 1950 年代的老式飛機所組成，不但航程短，全天候的攔截能力也受到限制，但是，目前中國空軍正緩慢的從以防禦（守勢）為主的武力，轉化為一支以攻擊（攻勢）為導向的部隊，具有更遠的航程和更大的殺傷力。雖然中國空軍逐漸引進像是殲十、殲十一（Su-27）和 Su-30 等新型戰機，也修改舊型的殲七和殲八型戰機，配上更好的電子設備和空對空飛彈。在維持老式戰機的戰力的同時，中國空軍也加速推動新型戰機的先進戰術和後勤技術。未來幾年內，中共空軍將會是更小型的兵力，但是比起 1990 年代的空軍，將具有更遠的航程和更大的殺傷力。¹尤其在冷戰結束後，中共戰略思維逐漸轉變，其分析如下。

第一節 國內環境的轉變

一、國際因素

1985 年蘇聯在戈巴契夫上台後，提出新思維政策，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開始轉變，到 1989 年，前蘇聯及東歐國家，如匈牙利、捷克、波蘭、南斯拉夫、東德、羅馬尼亞等並引發一波民主浪潮，紛紛由共產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亦所謂之「蘇東波」的效應，這股效應衝擊著美蘇對峙之兩極國際格局。1989

¹ 李憲榮、陳國雄等譯，李潔明（James R. Lilley）、艾倫（Kenneth A. Stokes）原著合編，《未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台北：玉山社，2001 年。

年底在東歐自由化及美蘇馬爾他高峰會之後，這種強調兩元對立的東西對抗，已開始日趨鬆解；而後續的東歐民主化、兩德統一，更加速此兩元體系的崩潰。1990年11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在巴黎簽署「歐洲裁減常規軍備條約」和互不侵犯的聯合聲明，正式宣告冷戰的終結；自此，列強之間所反映的國際政經關係與潮流，遂由政治與軍事的對抗，逐漸轉變成經濟的合作與安全的諮商。此一潮流，歷經1991年的波灣戰爭和蘇聯解體後，顯然更為確立，而使整個國際局勢邁入所謂「一超多強」多極多元化發展的後冷戰年代。²

在以經濟為主的思維下，快速結束戰爭並減少影響經濟負面因素的產生成為主要的考量因素，因此，後冷戰的國際局勢賦予了局部戰爭更多扮演的角色，據統計，自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間，世界各地共發生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117起，平均每年10多起，明顯高於冷戰期間每年4.5起的平均數。2000年至2001年1月，世界各地共發生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45起，超過1999年40起的總量，其中新發生的達21起，也大大超過了1999年的9起。³ 局部戰爭已成冷戰後最主要的戰爭型態。

冷戰結束後，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的局部戰爭首推波灣戰爭，這次戰爭，改變了傳統的作戰樣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形成的傳統戰爭觀念的改變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其中有別於傳統戰爭方式的主要表現為：⁴

(一) 空中力量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戰爭揭幕當天，多國部隊便出動各型飛機

1300多架次，對伊、科境內伊軍重要軍事目標進行突擊，特別是美軍最新型的F-117A隱形戰鬥機和AH-64「阿帕奇」反坦克直升機參戰，攻擊更是連連得手，使伊軍損失慘重。

(二) 電子信息戰成為戰場的「靈魂」。戰爭中，美國動用了75顆衛星，形

² 蕭全政，〈論中共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2004年12月，第22期，頁5。

³ 學習時報編輯部輯，高層訪談錄（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9月），頁261。

⁴ 王普豐等著，《現代國防論》（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1月），頁358。

成了龐大的偵察、通信、目標引導系統。美軍還裝備了上萬個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衛星通過這種接收器，給地面部隊指示方向，給炮兵指示射擊目標。美軍還出動電子飛機、預警飛機、反雷達飛機 120 餘架，電子戰部隊多達 5000 餘人，基本上保持了對伊拉克全方位、大範圍、高強度的日夜電子干擾。正是美軍電子信息的優勢，剝奪了伊軍實施反擊的能力，使伊軍成為戰場上的「聾子」、「瞎子」；C4ISR 系統使多國部隊牢牢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

(三) 作戰空域空前擴大，戰場向大縱深、高度立體化方向發展，不存在明顯的前方和後方。連續 38 天的空襲，是以空中力量為主，配合以大量的精確制導武器，對伊拉克要害部門的遠程打擊，從而模糊了前後方界限，形成一種非線式作戰樣式。

(四) 高技術武器大大提高了作戰能力，使作戰行動呈現高速度、全天候、全時域特徵。美國在這次作戰中使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幾乎所有高技術武器裝備，有人統計共 13 類 80 多種，其中有 50 多種是首次使用的。面對此一軍事變革，世界各國紛紛調整國防戰略，形成了一個國防和軍事戰略調整的世界性潮流。其較具代性國家之軍事戰略調整的大致情況為：

(一) 美國：1997 年美國參聯會提出「營造—反應—準備」新戰略，首次提出：從現在開始，美國必須「著手為變化莫測的未來做準備」。「準備」的內容包括革新美軍的作戰理論、作戰能力、技術裝備和組織結構，其核心是大力推進以信息戰為龍頭的新軍事變革，維護美國軍隊在 21 世紀的「壓倒性優勢」地位。

(二) 俄羅斯：1996 年 6 月，葉爾欽總統在《國家安全諮文》中正式提出國防軍事新戰略—「現實遏制戰略」，把立足於打「高技術局部戰爭」作為俄羅斯國防軍事戰略的基本目標。

(三) 日本：1995 年推出新《防衛計畫大綱》，明確提出「調整三軍武器裝備

發展重點，著力發展高技術裝備」，「加強軍隊的品質建設」。

(四) 印度：1994 年提出《自主防衛十年規劃》，在繼續遵循稱霸南亞，控制印度洋，爭當世界「一等強國」的國家戰略目標的框架下，強調在軍隊建設指導上，停止數量上的擴張，突出品質建設。⁵

這些戰略調整的共同特徵是因應海外戰爭後世界軍情變化，強調了高技術戰爭的重要性，但這些戰略調整均晚於中共。中共受到波灣戰爭的影響，1993 年 1 月，中共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重新調整軍事戰略的方針，明確提出「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來」。

二、國內因素

中共自 1978 年的經濟改革開始，至 1985 年廢棄人民公社止，在農村的承包制獲得很大的成功，經濟改革政策的繼續深化，乃為中共下一步國家發展的核心，這也直接影響到中共領導人對世界的情勢判斷。鄧小平在 1985 年 3 月 4 日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說到：「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⁶ 為了因應所認知到的國際環境的變化，鄧小平於同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裁軍百萬，並改變毛澤東對世界主要特徵為「戰爭與革命」的看法，將其調整為「和平與發展」，將「早打、大打、打核戰」之「人民戰爭」改為打一場「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於 1988 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式以「局部戰爭」取代「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成為中共新時期的軍事戰略，⁷ 這是

⁵ 可參見梁月槐主編，《外國國家安全戰略與軍事戰略教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年 6 月）。

⁶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頁 104。

⁷ 丁樹範，〈中共精簡軍隊內容、性質、未來〉《中國大陸研究》，1992 年 9 月，第 35 卷第 9 期。

中共軍事戰略朝高技術邁進的一個開端。

冷戰結束後，兩極化的世界格局消失，經濟因素已成為各國發展的主軸，各國的依賴程度由於經濟交流而日益密切，發生全面戰爭的機會已經微乎其微，在逐漸形成多極的世界格局中，新的力量均衡將取決於綜合國力的競賽，綜合國力首重經濟科技力量，中共必須致力於綜合國力的競賽。經濟發展首重穩定的周邊環境，並能確保沿海地區經濟利益的鞏固。

此種局勢的發展對中共來說，實具有正面的意義，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後冷戰的戰略環境，提供中共改善國際體系地位的機會。第二，中共和別的亞洲國家，不再被限制在以美蘇對抗兩極的國際格局中，北京現在可以自由的依照本身的意願，建立各種外交及經貿關係。第三，冷戰時期在亞洲的超級強國，其軍事及政治的影響力已經消退，所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給了中共許多運作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相對於冷戰時期的軍事對立，和平的周邊環境給予中共紓解為因應軍事威脅的軍事負擔，並提供了一個經濟發展及軍事革新的有利環境。⁸

這些環境的改變，促使中共對戰爭有了更新的想法。首先，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當代世界有遠見的政治、軍事家，都把發展科技、繁榮經濟作為立國之本，把避免戰爭、爭取良好的經濟建設環境作為戰略基點，軍事競爭籌劃的著眼點已從實戰向威懾轉變，從贏得戰爭向遏制戰爭轉變。其次，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是中共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階段，保持長時間的國際和平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基本保證。第三，現代戰爭，是高技術特徵明顯的局部戰爭，是以科技水平和經濟實力為後盾的戰爭，是損耗巨大、會為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

頁 56；Dennis J. Blasko. "Chinese Army Modernization: An Overview"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05), p. 68.

⁸ Denny Roy, "Restructuring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40.

生活造成重創的戰爭。⁹

綜合以上分析，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不論是國際格局的重整或戰爭型態的改變，皆使得高技術成爲戰爭的主要元素，而小規模，並講求速戰速決的局部戰爭成爲了後冷戰時期的主要戰爭型態，世界各國也紛紛調整軍事戰略以爲因應。這種趨向的演進，正符合中共自 1978 年以後以經濟爲核心的國家發展戰略，在營造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平和周邊環境」的前提下，打一場「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成爲中共後冷戰時期的新軍事戰略。

第二節 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

所謂「軍事戰略」，美國國防部 2006 年所出版的《軍事及有關名詞辭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對軍事戰略的定義爲：「一個國家運用武裝部隊之武力或武力威脅，鞏固國家政策目標之藝術與科學。」¹⁰ 中共定義則爲：「戰略指導者基於對軍事鬥爭賴以進行的主客觀條件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認識，全面計畫、部署、指導軍事力量的建設和運用，以保證有效地達成既定的政治目的。」¹¹ 綜合言之，軍事戰略即是指導軍隊建設及作戰的總方向。

一國的軍事戰略除了考量其本身條件並服膺於國家戰略外，也必須將戰爭型態的發展作爲軍事戰略制定的主要參考。簡言之，要了解當前戰爭的型態，才能以此制定合宜的軍事戰略。80 年代後，隨著科技的發展，高技術已使戰爭型態發生變化，進而改變了作戰理論。回顧戰爭歷史，其作戰型態及

⁹ 越勇民，〈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指導原則探討〉《國防大學學報》，1999 年 2 月，總第 114 期，頁 24。

¹⁰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2 April 2001, as Amended through 14 April 2006), p. 341.

¹¹ 王文榮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8。

內容的演進，主要的制約因素不外受到科技與理論的影響，如火藥、戰車、飛機、航空母艦的發明，改變了戰爭原本的風貌，也促使人們發展出相應的理論準則，以達到更有效率使用新武器的目的，並為下一次軍事革命醞釀新的元素，這是科技對理論的影響，¹² 然而理論也常常是科技發展的制約因素，戰車的設計方向，就深受德國閃電戰作戰理論的影響。¹³

在高技術的不斷發展下，一場新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正方興未艾，由於現代高技術發展的結果導致戰爭型態隨之改變，同時也促使戰爭思維、軍事組織、軍事倫理與行動準則等必須有所調整，平時與戰時之界限逐漸模糊，如何將「新科技」的成果精確運用於軍事領域，並且掌握時機進行軍事領域之必要變革，以增強國家的軍力與總體國力，將是未來戰爭勝負的重要關鍵。易言之，講求「科技建軍」、「軍民互用」、「軍民一體」的概念，將會愈趨明顯與普及，而「人與武器相結合的因素」可能成為「軍事事務革命」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¹⁴

最早的軍事革命概念起源於 70 與 80 年代的前蘇聯論著，特別是歐加科夫(N.V.Ogarkov)元帥所著一系列分析新科技革新的論文。當時學者提出「軍

¹² 李奧哈德(Robert R. Leonhard)持科技驅動理論的觀點，並指出從歷史演進的紀錄可以證明科技總是首先產生，而準則之後才慢慢地跟上。賽布洛斯基(Arthur K. Cebrowski)與加爾斯特卡(John J. Garstka)則認為，科技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作戰的方式。Robert R. Leonhard, *The Principle of War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Novato: Presidio, 2000), pp. 5-8; Arthur K. Cebrowski, John J. Garstka,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Its Origin and Future," *Proceedings*, vol. 124, no. 1 (January 1998), pp. 28-35.

¹³ 莫瑞(Williamson Murray)否定科技決定論，他以德國在二次大戰所發展出來的「閃電戰」(Blitzkrieg)為例，指出閃電戰成功並非德國科技的創新，因為戰車為英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發明，其相關理論也是由英國人富勒首先提出，其 1932 年所出版之《裝甲車》，被視為是戰車理論的奠基之作。然而，戰車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德國人廣泛的運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獲致巨大的成果。古德林閃電戰的理論思想，除了受富勒的影響外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壕溝戰的作戰的啟發，主要奠基在移動壕溝的概念上，此一理論思想對往後戰車的發展產生關鍵的影響；此外，西姆修尼(Jonathan Shimshoni)則認為，國家會因為戰略的需要，塑造科技的發展，以創造它所需的優勢。Williamson Murray. "May 1940: Contingency and Fragility of the German RMA" in MacGregor Knox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s., *The Dynamics of Military Revolution 1300-205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7; Jonathan Shimshoni. "Technology, Military Advantage, and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1990/1991), pp. 187-188.

¹⁴ 張中勇，〈中共「軍事事務革命」(RMA)與台海安全〉《軍事事務革命(RMA)與國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1999年3月)頁3-9。

事技術革命」一詞，日後變逐漸演變成爲軍事事務革命較爲整體的概念。¹⁵ 在「軍事事務革命」的研究中，對於什麼是「軍事事務革命」眾說紛紜。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認爲：「武裝部隊從技術到編制、戰略、戰術、訓練、條令和後勤等各個層次都同時發生變化，即是『軍事事務革命』。」美國新軍事革命倡導者之一安德魯·馬歇爾說：「軍事革命是指作戰概念和戰爭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特殊歷史時期。」《蘇聯軍事百科》載：「軍事上的革命是指科學技術進步和武裝鬥爭工具的發展在軍隊建設和訓練以及進行戰爭和實施作戰行動的方法上發生的根本變化。」¹⁶

這些理論的建構及相關科技的發展，經過彼此的驗證而日益成熟。1991年的波灣戰爭可說是一場驗證上述軍事理論及思維的典型高技術戰爭，正如上文所分析，此戰爭的影響，改變了戰爭型態的傳統思維。中共軍方深受震撼，其後的軍事事務革命的思潮，對中共領導人的軍事思維更造成強大的衝擊，認定高技術已成爲戰爭勝負的主要關鍵。受其影響 1993 年 1 月，中共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重新調整軍事戰略的方針，明確提出「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來」，而主要的作戰方向，第一是東南沿海，第二是南海，第三是中印邊境；發展的重點爲海、空軍，同時並提昇陸軍整體作戰能力，增強二炮威懾力量及建立快速反應部隊。¹⁷ 在此思維上，1995 年，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會中，確立「兩個轉變」的戰略決策：1、在作戰準備上，由應付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科技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2、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¹⁸

中共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主要表現在：1、國防戰略重點從著重於維護

¹⁵ 逢錦麟，〈淺論「新軍事革命」〉《青年日報》，1998 年 8 月 29 日，版 10。

¹⁶ 高春翔主編，《新軍事革命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 年 12 月），頁 1。

¹⁷ 國防部編，《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0 年 8 月），頁 28-29。

¹⁸ 蕭占中主編，《現代軍人素質全書》（北京：九州圖書，1999 年），頁 55。

邊境安全向著重於維護國家統一大業、安定團結局面以及避免和不得已情況下打贏由外力引發的局部戰爭的方向轉變。2、適應中國大陸社會的轉型和世界新的軍情變化，國防建設模式從數量規模型向品質效能型及集約型轉變，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3、軍事鬥爭準備從以打贏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為重點向能夠應付和打贏有霸權主義參與條件下的高技術局部戰爭為重點轉變。¹⁹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不願意放棄以武力收復台灣，以行使對台灣的「絕對主權」，然而科索沃（Kosovo）戰爭的經驗，對中共而言肯定是一個壞消息，中共必須也應該意識到科索沃戰爭是一項國際指標，因為後冷戰世界衍生許多新的國際法或戰爭法，而這些新的正好徹底打破中共的願望。因為即使中共從國際外交環境的有效運作中取得力量，但是科索沃戰爭卻凸顯一個問題——那就是「絕對主權」的概念正在逐漸弱化，而這正是目前中共戰略思考架構下「反分裂國家法」所無法破解的課題。因為有幾點事項值得中共注意：1、即使北約空襲已經結束，但科索沃情勢依舊動盪不安；可能必須有更多的軍隊被送上戰場，也就是說，人命犧牲、財產損失、國力消耗等成本代價仍在累計當中。2、政治上，沒有人懷疑「科索沃」是「塞爾維亞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份，但國際間對於「絕對主權」的概念正在弱化。就如一位專欄作家所言，「主權不能作為侵害人權的藉口」。²⁰ 3、軍事上，北約組織戰力之強大，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比中共大很多，但卻無法有效制服小小的塞爾維亞。相較之下，不管從任何標準來看，民主的台灣，各方面實力絕對優於塞爾維亞。4、中共在整個世紀中，極度關注主權概念，然而當前國際法的主權概念卻開始混合了令中共討厭的概念，像是「自決」和「人權」。由於南斯拉夫聯邦殘

¹⁹ 房功利，《中國國防戰略演變博士論文》（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04年5月），頁197。

²⁰ 人權是一個現代觀念，但人權一定是人類唯一可以接受的共識。趙達功，〈人權永遠高於主權〉《觀察》，大紀元，大紀元評論區，2000年12月7日。<http://guanCha.org>

暴執行「種族淨化」及「壓迫人權」，因此國際法庭宣布南斯拉夫聯邦總統米洛塞維奇（Iobodan Milosevic）及其相關官員均以戰犯罪起訴。²¹

第三節 攻防兼備的空軍戰略

何謂空軍戰略，根據中共軍方所出版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手冊—空軍分冊》的定義為：「空軍戰略是指導空軍作戰和建設的方略。它從屬於國家軍事戰略，是軍事戰略在空軍的具體運用。軍事戰略規定空軍戰略的性質，要達到的目標和任務；空軍戰略根據軍事戰略的要求，結合空軍的實際制定總體決策，充實軍事戰略。空軍戰略是空軍軍事學術的組成部分和最高層次，指導空軍戰役法和空軍戰術。」²² 中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空軍大辭典》的定義則為：「空軍戰略是空軍建設和作戰全局的籌創與指導的方略，從屬於國家軍事戰略。」²³

在軍事戰略的調整下，受其指導，中共空軍戰略也作了相因應的調整。尤其面臨國內外環境的改變及科技的發展，空軍的角色已發生了變化。由華人杰、曹毅風、陳惠秀主編，1992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空軍學術思想史》一書中，在論及影響空權理論發展的主要因素時，也有相同的論述。文中指出其影響原因有三點：1、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尤其是航空技術和機載武器設備的發展水平。2、戰爭經驗和對經驗的認知，包括自己的經驗和別人的經驗。3、國際形勢，一般說來，國際交往頻繁，科技活動發展，能促進學術理論的探討和交流，而世界局勢緊張時，又能推動軍隊建設、戰爭準備和軍事理論的研究。²⁴

²¹ 李憲榮、陳國雄等譯，李潔明（James R. Lilley）、艾倫（Kenneth A. Stokes）原著合編，《未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台北：玉山社，2001年。

²² 辛明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手冊—空軍分冊》（青島：青島出版社，1991年），頁154。

²³ 上海辭書出版社編，《空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年），頁6。

²⁴ 華人杰、曹毅風、陳惠秀主編，《空軍學術思想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頁4。

至於空軍角色的轉變，也出現在中共空軍將領的軍事論文中，如 2003 年 8 月 14 日，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劉廣智於《中國國防報》所刊之專文《新軍事變革大潮中的空軍》一文中指出：「新軍事變革在推動軍事技術進步的同時，也在有力地推動空軍作戰理論不斷向前發展。每一項新的空軍裝備技術的出現，都會相應地推出一種新的空軍作戰運用思想和戰術手段。從戰略理論看，全球作戰、全空域作戰、一體化作戰等理論，將成為空軍戰略力量運用和建設的重要思想。從戰役理論看，在傳統的空中進攻戰役、防空戰役的基礎上，發展和提出了空中封鎖戰役等新的戰役理論，特別是在戰役運用中，強調並提出首先使用、全程使用、獨立使用和可控性使用等思想，成為空軍戰役理論的新鮮內涵。從戰術理論看，電子戰成為空軍戰術的主要內容，精確打擊、結構破壞成為空軍戰術的新內涵，超視距空戰、防區外非接觸打擊、隱身突防成為空軍作戰運用的新樣式。」²⁵

回溯中共空軍戰略的演變，中共空軍在 90 年代以前一直以「國土防空」為其主要的空軍戰略，其原因在於「人民戰爭」守勢軍事戰略的主導下，促使一切軍事作為以陸軍作戰為核心，空軍的存在是依附在陸軍的戰略思維上，雖然因應世界潮流，中共成立獨立空軍。然而，事實上，空軍只是一支輔助陸軍打贏戰爭的戰術支援軍種，其任務僅止於對地面兵力的支援。²⁶ 陸軍成為中共因應強權入侵的主力兵種，使得中共空軍建軍後數十年間所研擬之理論與作戰模式，係以支持陸軍需求為主。

然而，隨著軍事技術的進步和空天力量的發展，使世界主要國家的空軍實現了由支援型空軍到聯合作戰型空軍、再到獨立作戰型空軍的三步大跨越。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實踐充分表明，在航天力量支援之下的空中戰爭雖然不是現代戰爭的唯一型態，但已取代陸戰和海戰成為戰爭的主要型態；空

²⁵ 劉廣智，〈新軍事變革大潮中的空軍〉《中國國防報》，2003 年 8 月 14 日。

²⁶ 楊中美，〈中共空軍戰略方針的演變形成〉《中共研究》，2000 年 10 月，第 34 卷第 10 期，頁 98。

天力量雖然也不是現代戰爭的唯一力量，但已取代陸軍和海軍成為主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力量。以空軍為主導的空天力量，事實上已經成為高技術局部戰爭的主角，甚至在科索沃戰爭中變成了獨立的角色。在這種戰場重心提升、力量重心位移的高技術戰爭條件下，將空軍擺在從屬地位的支援型空軍意識顯然過時，因為它既限制了空軍的發展，同時也限制了對空軍的使用。²⁷

這可以從近年來，戰爭空中化特徵越來越明顯得到證明。根據統計，二次大戰後的 190 餘場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中，有空軍參戰的達 90%。各軍事強國紛紛把奪取制空權寫進軍事條令，在作戰行動中越來越重視奪取和保持制空權，它預示戰爭的勝負已開始實現由地面決戰向空中決戰轉換。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的發展，期間世界上發生了 10 次較大規模的局部戰爭，其中有 8 次是空中力量參與或獨立完成的，而且是首先使用和全程使用空中力量實施戰爭行動。²⁸

以波灣戰爭為例，其整場戰爭中，體現了空中力量可以在一場較大規模的戰爭中發揮戰略和主導的作用。多國部隊通過空襲作戰，不僅全面奪取戰略制空權、戰場制空權和制電磁權，而且按照預定戰略、戰役企圖，成功地突擊了伊拉克的空中、地面和海上的各種軍事目標，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戰果。波灣戰爭大規模空中作戰顯示的驚人突防能力、突擊威力和破壞力，幾乎取得了過去認為只有核武器才能達到的破壞效果。這種情況說明，空中力量在高技術局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²⁹

近年來的這些戰例說明了，現代局部戰爭都是從空襲開始，並貫穿於戰爭的整個過程，空軍總是首當其衝，這已成為現代戰爭的一大顯著特點。而波灣戰爭又是空中力量的作用和地位表現得最為突出的一場高技術局部戰

²⁷ 蔡鳳震、田安平等著，《空天戰場與中國空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300。

²⁸ 沈水榮、葛善斌、王海粟，〈鄧小平制空權思想及其對國防建設的指導意義〉《中國軍事科學》，第 17 卷第 5 期 2004 年，頁 99。

²⁹ 〈空軍：高技術戰爭的主角〉《國際瞭望半月刊》，2001 年 1 月，總第 410 期，頁 49。

爭，它集中體現了在現代局部戰爭中空中力量使用上的發展趨勢，及在一定條件下空中力量可單獨達成戰略目的，空中突擊的威力和精度進一步提高，空中力量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³⁰

正如中共空軍前司令員劉順堯所說：「近些年來，特別是海灣戰爭以後，一些軍事大國常常依靠空中威懾和打擊來達成一定的政治、軍事目的，空中力量已成為實施戰略威懾的主要和首選力量，「禁飛區」、「空中保護區」、「空襲警告」、「以炸迫和」等空中威懾形式應運而生；兩軍交戰，空中力量往往成為首先使用、大規模使用和全過程使用的多功能作戰力量，戰爭通常從空中開始，並且空中作戰活動始終貫穿於戰爭的全過程；「空地一體戰」理論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較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一般都是三軍聯合作戰，「以空制地」、「以空制海」經實戰證明是最為奏效的戰法，可以說，空中力量已成為陸、海軍作戰威力的倍增器。³¹

中共空軍傳統戰略「國土防空」已不適合於現代戰爭的走向，並無法達成空軍所應擔負具攻勢及自主的積極角色。為了配合「攻防兼備」空軍戰略的轉變，中共空軍開始修正空軍作戰理論，強調由注重防空作戰向注重空中進攻轉變。即使進行防禦性的防空作戰，依靠傳統的攔截和空戰手段奪取和保持制空權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只有實施快速有效的空中進攻作戰，突擊敵方機場和壓制敵地面防空兵器的進攻作戰，才能轉被動為主動，奪取和掌握制空權。³²

空中武力對戰爭重要性受到中共軍方注意可回溯到 1980 年代，期間受到國際環境之英、阿福克蘭戰爭和以敘貝卡山谷之戰以及美國封鎖利比亞之西德拉灣軍事衝突等戰例的影響。中共多次研討解放軍未來現代化過程的戰略

³⁰ 章儉、管有勛主編，15 場空中戰爭—20 世紀中葉以來典型空中作戰評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267。

³¹ 劉順堯，〈著眼現代戰爭特點建設強大人民空軍〉《人民論壇月刊》，1997 年 8 月，總第 65 期，頁 20。

³² 張治昌，〈空中的優勢在進攻〉《解放軍報》，1994 年 10 月 14 日，版 3。

改變與軍力結構，中共軍方提出西方空軍在總體作戰中角色不僅止於配屬陸軍的支援軍種，或者是三軍合同戰役中的從屬角色。鄧小平十分重視空軍力量的發揮與運用，提出了建設「大空軍」和「取得制空權」的戰略思想，並且，鄧認為未來的戰爭，陸軍和海軍均需要空軍掩護和支援，若沒有空軍和制空權，解放軍是無法獲勝的。³³ 此時，中共軍隊的戰略構想和兵力結構之新觀點，已經開始改變了忽視空軍戰略與空軍的「從屬軍種」之地位。³⁴

受此影響，中共空軍逐漸醞釀出「攻防兼備」的軍事思維。其首次提出可以追溯到 1987 年，當時的空軍司令員王海在國防大學向三軍幹部講課時。在課堂中王海指出：「中國空軍應由『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戰略轉變」的戰略思維，然而並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1991 年波灣戰爭改變了戰爭的風貌，也使得人們重新認識空軍在戰爭中的重要性，這波軍事革命風也影響到中共空軍對本身戰略角色的重新定位，攻防兼備的戰略再次引起空軍內部的廣泛討論。1996 年原副空軍司令員劉順堯升任空軍司令員堪稱是最具指標性的人事安排，此舉展現軍事高層對中共空軍戰略朝「攻防兼備」轉移的決心。即使如此，內部仍對改革的方向及內容爭論不休。

1997 年初，中共空軍戰略部門邀請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空軍指揮學院等部門的有關人員，就空軍的戰略做定性研討，形成溫和、強硬兩派意見。溫和派提出了「快速反應，整體協調，縱深作戰」的十二字方針。該派空軍戰略雖考慮到現代高技術空戰的若干特點，但仍未能擺脫中共空軍國土防空與積極防禦的老思維框框。強硬派則根據美軍空地一體作戰理論和蘇聯戰區

³³ 雖然鄧小平時期已經逐漸重視空軍戰略和其作戰理論的發展，不過，此時期的中共空軍戰略無論在客觀理論或主觀理論中，均侷限於「積極防禦」的框架中，以至於只在「有限空間（即國土）之內與入侵之敵進行反鬥爭之研究，即所謂的防禦性的防空論」（主要論點包括「快速反應戰略」、「整體縱深打擊戰略」、「有限空間靈活反應戰略」等），這些戰略論點均只侷限於，「積極防空、重點支援」、「重點防空、積極支援」、「重點防空、重點支援」、「積極防禦、有限反擊」、「積極防禦、靈活反應」和「有限威懾、積極打擊」等論，實際上中共空軍仍尚未脫離「國土防空」和配屬陸軍進行聯合戰役從屬角色的有限思維。劉俊平，中國近現代國防思想史研究碩士論文（武漢：武漢理工大學，2005 年 6 月），頁 34。

³⁴ 劉俊平，中國近現代國防思想史研究碩士論文，頁 34。

戰略性戰役理論，以及美軍波灣戰爭中的空軍主導作用的事實，強調空軍具有獨立遂行戰略戰役任務的能力。因此他們提出「積極進攻，首當其衝，全程使用」的新十二字方針，兩派意見匯報給空軍領導層，中共空軍領導層也分成兩派。以空軍政委丁文昌為首的韓戰出身將領認為溫和派的十二字方針符合中共的國情和中共空軍的現狀。而劉順堯、吳光宇等傾向支持強硬派的十二字方針。³⁵ 兩派的戰略分歧報告給中共中央軍委會後，幾經研討、未能定論。

科索沃戰爭的發生，則發揮了為空軍戰略「攻防兼備」定性臨門一腳的功效。1999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領導層和中共空軍從科索沃戰爭中獲得啓示，即認為這是繼1991年波灣戰爭以來美軍主導的又一場更新的高技術局部戰爭，更是第一場以空軍開始最後以空軍結束，完全由空軍主宰戰場勝負的戰爭。它深刻的展現出高技術武器配合空軍的投射力量，在未來不接觸戰爭中除地對地戰術飛彈外，足以擔任首戰即決戰、首戰即夜戰中首戰先勝攻擊主角的事實。受其影響，中共中央軍委會作出最後裁決：空軍要加強空中進攻力量及相應的配套建設，逐步實現由「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中共空軍戰略也定性為：「*攻防兼備、首當其衝、全程使用*，重在主動攻擊的十二字方針。」³⁶

此項決議於1999年11月，在中共空軍慶祝建軍50週年紀念大會前夕，由司令員劉順堯中將與政委喬清晨中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正式宣佈「攻防兼備」為其空軍戰略的主張。並在訪問中指出：「中共空軍在新時期軍事戰略任務，將由消極被動的『防空型』向主動積極的『攻防兼備型』轉變，空軍的作戰任務在聯合戰役中，將從配屬陸軍的『從屬關係』角色調整到平等

³⁵ 唐仁俊，《解放軍空軍戰略之發展與演變》，國防大學空軍學院94年班畢業論文集，94年7月。

³⁶ 以上觀點及看法可參考華人杰、曹毅風、陳惠秀主編，《空軍學術思想史》，頁312；楊中美，《中共空軍戰略方針的演變形成》，頁102-103；楊中美，〈空軍司令員劉順堯〉，《中共研究》，2001年10月，第35卷10期，頁119-200。

『夥伴關係』，在加強作好防空任務的既有基礎上，突出加強空中進攻力量的份量，以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³⁷ 此外，他也強調：「一旦戰爭降臨到我們頭上，中共空軍在戰略上必須實行攻防結合、注重以進攻手段獲取主動，防空作戰也必須把積極抗擊和有效反擊結合起來。」³⁸ 至此，中共空軍正式完成「攻防兼備」空軍戰略之定性工作。

³⁷ 張農科，〈向攻防兼備型轉變—訪空軍司令員劉順堯中將、政委喬清晨中將〉《紫荊雜誌》，1999年11月5日，總第109期，頁5-9；〈中國空軍決加強進攻力量—劉順堯司令稱將盡快完成由防空型轉向攻防兼備型〉《文匯報》，1999年11月8日，版A1。

³⁸ 〈解放軍加強空中攻擊力〉《蘋果日報》，1999年11月8日，版A18。